

■ 图片故事

一生守护滚烫初心

□ 张博琨 张蕴良

在海淀区羊坊店铁路东宿舍的老楼里，95岁的王德才坐在沙发上，柔和的灯光落在他布满皱纹的脸上，那双曾见证过烽火硝烟的眼睛，望着桌上泛黄的军装照——照片里的两个青年身姿挺拔，眼神亮得像夜空里的星，那是战争胜利后王德才和战友在前门车站前的合影留念。

“那时就一个念想，把日本兵赶跑，能吃饱饭、睡安稳觉，就算拼上这条命，也值了。”说起80多年前的往事，老人声音里仍带着穿过岁月的坚定。

1930年，王德才出生在冀中平原。7岁那年，“七七事变”后的炮火撕碎了村庄的宁静。日军进了村，烧杀抢掠，全村几十户人家的青壮年被杀害，其中就有他的父亲。

“眼睁睁看着日本兵把粮食抢走，把房子点着，心里像揣着一团火，烧得疼。”王德才攥紧了拳头，指节发白。那时村里只剩妇女儿童，他跟着母亲忍饥挨饿，13岁就去地主家干活，吃不饱穿不暖是常事，“那会不懂啥叫家国，就知道‘安稳’俩字，比登天还难。”

1945年3月，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打破了村庄的沉寂——是路过的八路军。这天，一名战士从牛棚中拉出了瘦小的王德才，掌心的茧子蹭过他冻裂的手背，竟带着炭火般的温度，那温度顺着指尖一直暖到心里。王德才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，装着满心的信念跟着队伍走了，成了河北省十分区平安支队的一名战士，那一年，他15岁。

第一次上战场是在河北省固安县，子弹嗖嗖地从耳边飞过，身边的战友倒下了。“眼泪都没顾上擦，抓起他的枪接着打，连着打了7天，不知道累。”老人眼里闪着光，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。刚入伍时他连枪都扛不稳，却凭着一股“不怕



王德才老人和老伴展示老照片（摄影：程宁）



图中右侧为年轻时的王德才

死”的劲头，在枪林弹雨中迅速成长。

“那会是敌后作战，全靠群众掩护。”王德才记得，部队扎营、作战都离不开老百姓的支持，“军民一心，才有了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机会。”

1946年下半年，因作战英勇，王德才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从抗日战争的敌后战场到解放战争的正面战场，从筹备渡江战役到见证北平和平解放，他的

足迹里刻满了时代的印记。

1949年4月，王德才所在的部队开始在北京公安系统执行任务，主要负责门头沟站的安保工作。“从扛枪打仗到维护治安，变的是岗位，不变的是保平安的初心。”他承担过多次重要任务的警卫工作，“心里就一个念头，岗必须站好。”

1958年，王德才调到永定门站，脱下公安制服，成了一名铁路工人。从客运员到食堂主任，从支部书记到工会负责人，岗位换了一个又一个，他始终记着“为大伙办实事”。当食堂管理员时，他总为上早班、下夜班的职工备好热乎饭菜；同事老吴腿脚不便，他跑前跑后争取福利，最终为他置办了一台手摇车。“战争年代靠军民一心，和平时期就得干群一心。”老人笑了，“我当工会负责人那阵，职工有啥心事都愿意跟我谈，他们信我，我就不能辜负这份信任。”

如今，王德才和老伴住在宿舍里，日子过得平静而踏实。“这辈子没干过啥惊天动地的大事，就是跟着党，从战场到岗位，尽一份力，做到问心无愧。”他摩挲着照片，声音里满是感

慨，“现在国家富强了，年轻人能安安稳稳上班、上学，这就是我们当年拼命想要过上的日子，要珍惜。”

临走时，老人颤颤巍巍地站起来，握着双手一个劲致谢。阳光透过窗户，照在他佝偻却依旧挺直的脊梁上。“党和国家没有忘记我们啊。”他反复说道，“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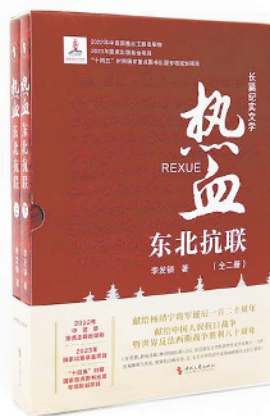
天的幸福生活。只要国家需要，咱中国人，啥时候都能站出来！”

王德才不是传奇，他只是千万个扛枪少年里幸运活下来的那一个。但正是这千万个“他”，用血肉之躯，在1945年的秋天，铺就了通向黎明的路。而如今，他们守望的模样，早已成了这片土地最动人的风景。

雪地里的火炬

——读《热血：东北抗联》

□ 王玉美



当《智取威虎山》的唱词在风雪里震响，《热血：东北抗联》的书页间便跃出无数冻僵的手指，正攥着步枪扳机扣向黎明。这部纪实小说以白山黑水为纸，以血与火为墨，将东北抗联的铁血岁月凝固成可触摸的历史温度，让80年前的风雪依然能刺痛当代人的眼睛。

书的开篇如冰河开裂，从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建立党组织的根系写起，慢慢舒展成抗联将士的精神年轮。北大营的枪声里，有自发抵抗的军警攥紧生锈的枪栓；江桥抗战的冻土上，马占山将军的马蹄踏碎零下40℃的严寒；山林队的篝火旁，猎户们用猎枪瞄准侵略者的军靴。那些从自发到自觉的抗争轨迹，恰似长白山脉的走向，在曲折中始终向着光明。当各路武装最终汇入抗联洪流，字里行间便奔涌着江河归海的力量——这不是简单的军事集结，而是一个民族在绝境中重新凝聚的心跳。

史料的坚硬与文学的柔软在此共生。作者像考古者般拂去历史的积雪，杨靖宇胃里的树皮草根，在书页间长出年轮；赵一曼留给儿子的遗书，每个字都带着镣铐的温度。那些抗联战士在雪地里传递的火柴，不仅点燃了取暖的篝火，更在字里行间化作跳动的意象：“棉衣里的虱子比子弹更让人难熬，却咬不破他们贴胸的党章”。这种虚实交织的笔法，让历史不再是博物馆里的旧枪，而是仍在血管里流动的热血。

英雄群像的塑造如松涛阵阵，杨靖宇、赵尚志、赵一曼们不是被供奉的神像，而是带着体温的战士。作者写赵尚志率

队奇袭据点时，会在战斗间隙给伤员讲家乡的皮影戏；写赵一曼在狱中的最后一夜，月光透过铁窗在她脸上织出银网。这些细节像雪地里的火种，让英雄主义褪去说教的外壳，露出生命本真的光芒。当杨靖宇最后一次扣动扳机，子弹穿过的不仅是敌人的胸膛，更在历史的幕布上打穿了一道光，让后来者得以窥见一个民族不屈的脊梁。

书中的风雪是有重量的。零下40℃的严寒里，步枪的撞针会冻成冰棱，战士们用体温焐热枪栓再扣动扳机；棉鞋磨穿后，他们裹着麻袋片在雪地里奔跑，脚印里渗出的血珠瞬间冻成红宝石。作者计算过这样一组数据：抗联将士平均每人每天要在雪地里跋涉30里，面对10倍于己的敌人，用3支枪分享5发子弹。但这些数字从未压垮叙事的翅膀，反而让“火烤胸前暖，风吹背后寒”的歌声更具穿透力——这不是苦情的渲染，而是生命力在绝境中的绽放，恰如兴安岭的偃松，越是被风雪压弯，根就扎得越深。

这部书最动人的，是让历史成为可对话的存在。那些在雪地里倒下的战士，仿佛正站在时间的对岸看着我们：他们不是要后人的眼泪，而是要我们接过他们未竟的理想。就像书中写的那样：“抗联密营的篝火从未熄灭，只是化作了城市的万家灯火”。当我们在新时代的征程上遇到困境，不妨想想那些在零下40℃里依然前行的身影——他们教会我们，真正的勇气不是不害怕，而是带着恐惧依然向前；真正的信仰，是明知前路漫漫，仍愿意做照亮后来者的火炬。

80年后的今天，长白山上的积雪融化，汇入松花江的浪涛。《热血：东北抗联》就像一座横跨时空的桥梁，让我们能触摸到80年前的脉搏。那些在雪地里凝固的热血，其实从未冷却，只是化作了民族的基因，在每个中国人的血管里静静流淌。

书海掠影



人生课堂

□ 杨丽丽

教室的钟声和地头的蝉鸣总在记忆里重叠。父亲一手执粉笔，一手握锄头，在黑板和田垄间画出两条平行的线，将我的童年分成两半：一半写满汉字公式，一半埋着种子新芽。

清晨的露水还挂在麦苗尖时，父亲已在堂屋小饭桌前备课。他的备课笔记写在泛黄的作业本上，边角粘着去年的麦屑。我趴在桌边看他用红笔勾画重点，那些波浪线像极了田垄间翻涌的麦浪。有时粉笔灰落在他肩头，与衣领上的泥土混在一起，成了独属于他的勋章。

放学归来常能在田间寻见父亲。他总把教案本卷成筒别在后腰，弯腰插秧时，白纸黑字便随着他的动作忽隐忽现。有次我蹲在田埂上写作业，墨水被风吹到稻叶上，父亲直起腰笑着说：“字写进土里，明年会长出学问来。”那时我当真埋下半页作文纸，来年扒开泥土，只见蚯蚓在字句间钻成密密麻麻的小洞，倒像是父

亲批改作业时画的批注。

农具房的木架上，粉笔盒与种子袋并排挂着。父亲用分秧的手捏粉笔，在黑板上画出工整的田字格；又用写字的手撒谷种，让每个种子都像标点符号般落在恰当的位置。他教我解数学题时说：“算不清田亩，庄稼就长不踏实”；教我插秧时又说：“字要像禾苗，横平竖直才能立住”。两种截然不同的知识，在他手中竟成了同一种道理。

夜晚，父亲常在灶屋改作业。煤油灯的光晕里，作业本与晒干的玉米棒堆在一起。我趴在灶台上烧火，看他用红笔圈出错别字，火星子便跟着在炉膛里跳跃。有时他会突然起身，抓过窗台上的温度计跑到院子里，借着月光查看夜间的温度——玉米晒得好不好，和学生的成绩一样，都是他放心不下的牵挂。

那年我参加作文比赛失利，蹲在田埂上哭。父亲正在割稻，镰刀声戛然而止。他摘下草帽铺

在地上，让我坐在金黄的稻堆里。“稻子低头是因为饱满，”他擦着汗说，“文章写不好，是心里的粮食还不够。”说着弯腰捧起一把泥土，“你看这地，年年种年年收，总不会亏待下功夫的人。”风掠过稻田，沙沙声混着他衣服上的粉笔灰，落进我翻开的笔记本。

如今我在城市的写字楼里敲击键盘，父亲仍守着那块黑板和几亩薄田。每次通电话，他总说“新栽的桃树挂果了”，又不经意提起“班上出了个作文写得好的娃”。我忽然明白，他这辈子都在播种：在黑板上播撒知识，在田地里播撒希望，而我，就是他最珍视的那株青苗，在两种养分的浇灌下，终于长成了自己的模样。

回望时光深处，我总会想起父亲在田埂上批改作业的身影。粉笔灰与泥土、黑板与田垄，那些看似割裂的岁月，原来早被他用无形的线，缝成了完整的人生课堂。